

# 區分香港政治主次矛盾

□周八駿

主而支持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的香港居民，處於日益糾結的心理矛盾。

## 兩個「大多數」明顯交叉

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由於貧富差距加大而形成的階級對立日益激化，為數極少的大地產集團成了社會大眾發泄怒氣的對象。

如果支持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的大多數是與反對大地產集團的大多數相重疊的，那麼，香港政治格局就將變得簡單而明瞭。事實是，情形頗為複雜，兩個「大多數」不相重疊，而是明顯交叉；不僅使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的政治決策和行為面對前所未見的困難，而且使特區新一屆政府的管治陷入「兩難」。

特區政府解脫管治「兩難」的適當途徑是：引導那些信仰西方民主的香港居民，將追求普選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結合起來，在香港政治轉變、經濟轉型和社會演進之間取得平衡。

惟此，才能爭取香港社會廣泛共識——既推動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又發展與國家主體經濟融合相適應的政治民主；既推進香港民主政治實現普選目標，又推進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既發展民主、加快經濟轉型，又保持「穩中求變」的基調，同時，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從而使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能夠克服險阻、踏足坦途。

愛國愛港陣營、尤其中堅力量，也必須以同樣的策略來區別對待香港政治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盡可能團結所有信仰西方民主的香港居民（選民），盡可能壯大愛國愛港陣營。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 知微篇



周八駿

有一種觀點認為，打着「民主」旗號而「拒中抗共」的香港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在歷次立法機關地區直選議席競逐和區議會的直選中，都能取得大多數選民支持，因此特區政府視反對派為「敵」是與香港民意為「敵」。這是政治上不智的表現。

關於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性質是否「你死我活」的「敵我」性質，筆者在2月7日本欄《港內矛盾絕非「你死我活」》中已做分析。這裡，進一步說明：必須將香港相當一部分信仰西方民主而投票支持反對派的選民（居民）與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嚴格區別開來。

香港政治的基本矛盾是：為若干西方國家所操縱的「民主派」與中央政府和愛國愛港陣營之間的矛盾，雙方鬥爭焦點是爭奪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無論關於特區管治班子組成還是香港政制改革，都始終圍繞着這一核心問題。

這是當前和今後相當一段時間，香港政治的主要矛盾。與之相聯繫，香港政治還有次要矛盾，即：在

意識形態或價值觀上，相當一部分信仰西方民主的香港居民（選民）與越來越多堅定支持愛國愛港陣營的香港居民之間的分歧。

至今，關於民主的理論和成熟的制度模式是西方的。在香港，由於歷史因素和教育因素影響，相當多人信仰西方的民主觀和政治制度。其中，不少人因為意識形態或價值觀的緣故，對於國家主體政治制度和相應的政治觀點持異議甚至反對的態度，從而在香港立法機關地區直選和區議會的直選中投票給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

## 兩級議會選舉呈現反差

然而，這些香港居民（選民）與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有明顯區別。一是在政治立場上，表面看，對待國家主體政治制度的態度相同，其實，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是欲「推翻」國家主體政治制度、以西方政治制度取而代之，而那些香港居民（選民）則是停留在不滿和反對的情緒，沒有「推翻」的意圖，更沒有類似的實際活動。

二是在人生觀上，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是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照搬西方政治模式、進而「和平演變」國家主體政治制度為志向，而那些信仰西方民主的香港居民（選民）則是以提升個人和家庭的物質

生活水平為主要追求。

這兩方面是相聯繫的。因為人生的追求主要是非政治的。所以，對於國家這些年來給予香港經濟發展的關照看在眼裡、記在心裡，所以有政治傾向但不在行為上與反對派走到一起。

香港相當一部分居民（選民）與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的重要區別，香港政治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解釋了並將繼續解釋香港政治撲朔迷離現象。

為什麼多年來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在立法機關地區直選的成績與他們在區議會直選的成績往往呈現反差？為什麼2012年反對派能夠在反對國教育一役取得似乎聲勢浩大的支持而在緊接着舉行的第五屆立法會地區直選的成績明顯退步？不就是因為存在着上述區別。

所以，不做分析，籠統地說與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為敵」便是與香港大多數居民「為敵」，不僅與事實不符，而且，產生很壞的政治影響。

從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以來，至今，乃至今後相當一段時間，香港特別行政區一直困擾於兩對矛盾——

在政治上，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愈益惡化，為若干西方國家操縱的反對派與中央政府和愛國愛港陣營之間的鬥爭進入決戰階段，同時，越來越多信仰西方民

# 制度追求切莫教條化

□周全浩

一切的制度、社會運動或革命，都應為國家人民服務，而非為一些所謂的原則服務。有些人推崇普世價值，把某些原則或價值絕對化，成為教條，如民主、法治。終審法院審理「莊豐源」一案，未有考慮基本法立法原意，最終根據字面法理判決，為了法理和原則而不顧後果，損害了香港市民的權益，就是教訓。任何制度和政策最重要是可行、有效，更應惠及人民。

## 議論風生



周全浩

國家領導人習近平頻頻探訪貧困地區，反映現屆政府十分重視扶貧工作。中國改革開放成果分配不均，導致貧富懸殊問題嚴重。部分百姓只享受到很少，甚至享受不到任何改革開放的成果。部分老一輩人的生活質素並沒有因改革成功而得到改善，一些人不免會疑問，支持革命數十年，究竟所謂何事？不少落後地區的人民，依然生活窮困。現屆政府終於注意到這群人民的需要，積極扶貧，實在可喜。

現屆政府要實踐民族復興，便要繼續走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世間沒有一個最好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各國應摸索一條最適合自己的道路，發展獨有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這條道路將對整個世界的文化和經濟進程有貢獻和幫助。中國已摸索到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的發展模式結合了計劃和市場經濟，部分西方學者稱之為中國發展模式。

## 切莫迷信「普世價值」

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發展，均建立在自己國家的固有歷史和文化基礎上，其他國家沒有相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根本模仿不來。有些人覺得，世界上有些制度和價值觀似乎適合每一個國家，必須要跟隨，否則便會落後，即所謂的普世價值。然而，仿效其他先進國家的發展模式，做得再好亦難以超越模仿對象。

近年，內地一些有識之士亦了解到，國家發展不能完全模仿別人，應回到自身文化的根本，重新考量儒、道、法等中國傳統思想對當今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儒家注重社會和人倫秩序，提倡忠君、親慈子孝、兄友弟恭，同時，不走極端，重中庸之道；道家則崇尚自然，提倡和諧。正如近年中國提倡

社會和諧、關注家庭倫理，反映不少中華文化和特色，對國家當今發展有一定啓示和幫助。

人民對宗教不太狂熱，是中華文化特色之一。部分伊斯蘭教國家，人民十分重視其信仰，甚至實行原教旨主義，完全跟從所有教條，然而部分教條不利經濟發展，令國家落後。中國則未有因宗教而阻礙經濟發展。

中華文化着重家庭觀念、鄉土情重，亦有利經濟發展。由於家庭觀念重，中華文化區內的家庭生意可以發展到很大，幫助社會的資本累積。另外，中國人飲水思源，鄉土情重，離鄉別井的海外華僑不忘寄資金回國。改革開放後，大量外資流入，大部分來自港澳地區，亦有不少來自海外華僑，如東南亞、歐美的華僑。這些資金來源對於中國改革開放成功尤其重要。

## 中國模式值得肯定

同時，中國人擁有勤奮、節儉和好儲蓄的美德，有助國家強盛。不少華僑移居到菲律賓、東南亞等地，大多是赤手空拳到這些地方發展，現在卻對這些國家經濟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中國人既勤奮又好儲蓄，金錢漸漸累積，對當地的影響力亦加大。一位西方名教授熟悉東南亞的情況。他說，看到華僑做到如一隻狗（work like a dog），非常勤勞，緬甸人和馬拉人卻學習了英國人的高尚生活，閒時打高爾夫球，嘆下午茶，結果華僑操控了當地的經濟。

加上，中華民族有積穀防饑的觀念，未雨綢繆，有利發展。相反，西方倡議先使未來錢，結果金融海嘯來襲，西方國家無一幸免，美國、歐盟、希臘等都出現經濟危機。反觀中國並沒有受到重大損失，全賴這種傳統美德。很多香港人盲目崇洋，只着眼別人的優點，而忽視了自己國家的優良文化。事實上，中國文化裡有不少優點是西方文化所沒有的。

再者，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建立了強大的中央

政府，具備龐大的組織和動員能力。在這兩個條件下，解放軍把土匪徹底剿滅，把過千年未能根絕的土匪問題解決。另外，「一孩政策」能成功實施，也全賴這兩個條件。中國人口政策成功，使中國人民生活質素三十年間得以大大提升，否則將如印度般，人口高速增長，妨礙人民生活水準的提升。

農業、工業、教育、國防和科技亦因而得以急速發展。近年太空科技快速發展，發展「兩彈一星」，研發核武、火箭、人造衛星技術和太空科技。教育亦有更全面發展，特別是高等教育。基建發展方面，大力擴展公路和鐵路，建構五縱五橫的交通網。凡此種種，全因強大的中央政府、龐大的組織和動員能力，同時也是市場經濟、計劃經濟結合所帶來的成果。

## 「莊豐源案」是個教訓

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是別的國家難以模仿的，如解放軍的救災能力。每當發生天災人禍，國家能即時動員大量解放軍救災，而一般國家難以短時間內動員如此多的軍隊。解放軍搶險救災範圍廣泛，不論天災、人禍均隨時奉命。這跟解放軍建軍的思想哲理有關，作為人民軍隊，人民有需要，便有責任提供援助。

各國有獨特的歷史和文化，每一個國家都應根據國情找出最適合的道路，發展屬於自己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不必模仿別人。同時，一切的制度、社會運動或革命，都應為國家人民服務，而非為一些所謂的原則服務。有些人推崇普世價值，把某些原則或價值絕對化，成為教條，如民主、法治。終審法院審理「莊豐源」一案，未有考慮基本法立法原意，最終根據字面法理判決，為了法理和原則而不顧後果，損害了香港市民的權益就是教訓。胡錦濤提倡以人為本，鄧小平提倡實用主義，反映任何制度和政策最重要是可行、有效，更應惠及人民。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訪問教授

# 以「共同價值」取代「普世價值」

□鄭海麟

## 有話要說



鄭海麟

近年來，由於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及綜合國力大幅度上升，高科技如太空衛星、遠程導彈等迅速發展，還有巨額的外匯儲備，這些因素和硬性指標使大陸有部分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加上歐美等部分西方國家中時不時產生以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杯葛中國的舉動，致使部分知識分子中間產生了一種反西方文化、否定所謂「普世價值」的思潮，這種思潮與近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以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胡適、陳獨秀等為代表）主張開眼看世界、提倡向西方學習的思路大異其趣，與「五四時期」呼喚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甚至鼓吹「全盤西化」的思潮更是不相逕庭。在這種思潮影響下，部分知識界人士開始懷疑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及人權、自由等概念，於是在思想界挑起了一場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

## 「普世價值」引爭論

在了解這場爭論之前，有必要對何謂「普世價值」稍作介紹。按辭書的解釋，「普世價值」泛指那些不分區域、超越宗教、國家、民族、任何一個自詡文明社會的人類，只要本於良知與理性皆認同之價值、理念。至於「普世價值」的內涵，包括人

道關懷、人本思想、人權觀念、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公平公義、多元包容等等。由於理性的人文主義運動是從近代歐洲文藝復興開始的，因此，「普世價值」的概念內涵無疑帶有濃重的西方色彩。隨着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普世價值」的核心日益穩固，特別是關於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天賦人權等觀念，為所有具理性和良知的人們普遍認同。

中國大陸對「普世價值」持否定態度的人士，其持論依據主要認為所謂「普世價值」，只是歐美等西方國家將適合自己國情和國家發展的價值觀念泛化和普遍化，並且將其到處推廣，甚至強迫不認同這些價值觀念的國家和民族接受。

比如關於人權：贊同「普世價值」的人士認為，「人」的位階在國家之上，「人」才是國家存在之目的，而非「人」是為國家而存在。因此，人權高於國家主權，國家有義務捍衛「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如生存的權利、免於恐懼的權利、知的權利、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集會遊行的自由等等。否定「普世價值」的人士則認為，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國家主權高於人權，沒有國權，哪來人權？近代中國飽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壓迫，試問西方列強何曾尊重過中國人民的人權？因此，爭取人權首先必須伸張國權；西方國家今天以人權作為「普世價值」強迫中國人接受，就像昨天用「堅船利炮」強迫中國人接受鴉片一樣，目的都是為了干涉中國的内政。

又比如「民主」：贊同普世價值的人士認為，「民主」政治就是肯定人民為國家真正的主人，政府是由人民委託產生，執政者的權力只不過是受人

民暫時委託所賦予，政府若做得不好，人民隨時可將委託的權力收回。否定「普世價值」的人士則認為，民主只是一種政治方式，它的實質內容就是多數決定，然後由全體公民行使公共權利。但是，從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民主實踐經驗來看，民主政治往往有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弊病。況且，在公民素質較差、法制不健全的國家和地區，民主政治的多數決定還會產生多錯的情形。特別是像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和文化程度發展極不平衡的大國，如果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不但難於實行，而且還會造成極大的混亂。

## 「共同價值」更貼切

以上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贊成和否定雙方各有所本，似乎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極端民族主義者對「普世價值」持否定態度，理性的知識分子則肯定和認同「普世價值」。至於官方學者的態度，從維護現行政治架構和自身已得利益的角度，他們不贊成「普世價值」；但在處理國際關係或涉外事務時，又不得不正視「普世價值」的客觀存在。特別是胡錦濤、溫家寶等領袖人物在許多場合都以肯定的口脛提到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人道關懷等概念。因此，官方學者近來又別出心裁地將「普世價值」中胡、溫提到過的概念歸結為人類「共同價值」，以示有別於西方國家強調的「普世價值」概念。相信在官方學者和媒體的主導下，將會以「共同價值」取代「普世價值」的概念，借予止息有關「普世價值」的爭論。

作者為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 「族群政治」荼毒香港社會

□陳文鴻

## 報刊文摘

香港「族群」的理念最近時常在報紙和電台的談話節目中被提起。這個概念源自於一些主張自治的個人著作，現在已經逐漸波及到整個香港這個在《基本法》保障下、在「一國兩制」體制中高度自治的地區。一些擁護「族群」的人甚至呼籲香港市民建立一個完全脫離祖國大陸的獨立國家。

這不禁使人想到台灣民進黨的文化戰略。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隨着島內各地選舉政治的蔓延，民進黨理論家提出了「台灣四大族群」的論點。這「四大族群」分別是「福佬人（閩南人）」、「客家人」，「來自中國大陸其他省市的移民」以及「台灣原住民」。我認為，前三個族群都屬於漢族，僅在語言文化方面有所不同，因而大可不必單獨歸類。

除了福建和台灣，福佬人和客家人還分布在全國各地。這些所謂的「族群」並不像漢族和回族那樣存在明顯的差異。民進黨所劃分的四個「族群」之間雖存有不同的社會文化習俗，但這些差異不足以用來作為劃分不同「族群」的依據。

民進黨理論家的族群劃分並沒有清晰的理論依據，充其量只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通過把當地的「台灣人」（特別是從閩南入台的老一輩移民）與從其他各地遷入的「外省人」（新移民）相區別，民進黨人試圖誇大這兩個族群之間的差異，從而支持其希望台灣脫離大陸的政治目的，推動「台灣」議程。而這項含糊不清的關於「族群」的錯誤觀念，如今已經演變成「台灣」勢力所倚重的文化和政治策略。

如今香港也正面臨着這一政治問題。一些激進人士並不希望看到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發展現狀，反倒希望香港完全脫離祖國而獨立存在。這些持有「香港人與大陸漢族分屬不同族群」觀點的擁護者，正是在最近一系列示威活動中公然揮動港英旗幟的激進分子。他們企圖使人們相信，他們正在為建設一個擁有殖民歷史的「新香港」而奮鬥，事實上毫無新意。

香港本土的金融資本和地產開發商對於本地經濟的過度控制已經嚴重扼殺了企業家精神和企業的經濟發展空間。但中國內地中產階級強大的跨境購買力卻為香港創造了每年高達3000億美元的零售額，佔香港每年銷售總額的一半以上；並以此為香港本地增加了成千上萬的低薪工作崗位，從而使失業問題不再成爲一個社會問題，香港也在緩慢平穩的經濟發展中逐漸得益。然而，這一態勢並未能為香港本土新興產業的發展帶來足夠的動力。香港的中產階級群體仍在萎縮，年輕一代也逐漸失去發展和掙扎的動力，特別是在金融海嘯過後，香港引以為傲的金融業也遭到了重大損失。香港政府巨額的財政儲備和本地接近飽和的就業規模並不是社會和諧和政治穩定的保障。似乎每個人都開始認為香港社會兩極化嚴重，而最近立法會的選舉結果又再次加深了這種印象。

如果在這個關鍵的歷史節點上，出現了偽「族群」的政治訴求，那麼原本就存在的兩極分化現象將給香港社會帶來更多的政治裂變。1997年以前，香港的政治運動一直致力於反對殖民主義以及推動民族主義，然而回歸後卻變成了「公民社會」對抗特區政府。「族群」的偽概念威脅着社會的穩定，長此以往勢必將造成香港社會的政治撕裂轉型。「香港獨立」或「香港自治」的倡導者，尚未意識到或不敢公開承認他們所從事活動是具有顛覆性質的行為。他們從不用溫和的方式向立法會或政府進行游說，表達對社會和政治不滿的唯一手段就是進行大規模示威遊行。雖然日漸普遍的網絡暴力尚可容忍，但日漸成風的街頭暴力絕對不能姑息。因為肢體衝突不會導致任何具有建設性的政治妥協。

香港政府和香港社會都應該充分意識到「族群政治」潛在的破壞性影響，萬不可為其提供生長和擴展的政治空間。

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總幹事  
本文摘自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